

論 点 摘 編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

张文显在《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伟大实践中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其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在概念上系统集成、在话语上自成一体、在逻辑上有机衔接,展现出鲜明的理论风格、深厚的历史底蕴、开放的全球思维和雄浑的实践伟力,蕴含着睿智的法律哲理、鲜活的法治道理、深刻的法学原理、隽永的法理情怀。基于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的理论旨趣,可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划分为三个层次三大板块,即法治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论、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观点。其中,法治的基本原理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内核,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观点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要素。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型全球性文明的开创

田江太在《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撰文指出,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对以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的批判和超越,意味着开创一种新型全球性文明。新型全球性文明新在人类主体优先超越资本逻辑和民族国家主体优先,新在以非零和的互利共赢原则取代零和思维的你输我赢原则,新在以文明交流互鉴取代文明的冲突和对抗。新型全球性文明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和灵魂,全球性生产力的发展和新兴科技革命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动力,人类的共同利益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基础,新型

文明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理念。

文明形态延续视域下的中国道路自信

陆轶之在《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道路自信基于它借鉴和吸收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创造的各种不同文明形态的优秀成果。在游牧(渔猎)文明、农耕文明、商业文明和工商业文明中,高举创新和发展大旗的是农耕文明和工商业文明,它们曾在历史上长期领先于世界和最终主导世界。中国道路以在中国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培育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为“民族内核”,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本内核”,以工商业文明的科技主导、竞争发展、创新驱动为重要推动力。中国道路的自信在于它创造的巨大成就,兼容并蓄不同文明成果,更在于它努力构建的不同于其他文明形态的新的社会文明。

人民主体地位在中国制度中的多维体现

金民卿在《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制度的本质属性,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制度的重要原则。人民主体地位需要全面具体的分析,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原则性层面,更不能仅仅做口号化宣传。具体来说,人民是中国制度的创造主体、权力主体、利益主体、评价主体和监督主体。创造主体地位问题的核心是要明确制度由谁创造,依靠谁发展和巩固;权力主体地位问题的核心是要明确权力来源于谁、制度属于谁;利益主体地位问题的核心是要明确制度为了谁,由谁享有;评价主体地位问题的核心是要明确制度由谁来评价,谁是评卷人;监督主体地位问题的核心是要明确制度合理与否,制度执行效果由谁来监督、批评和促进。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伦理结构

涂小雨、徐明璐在《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遵循的政治伦理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的本质合法性——实现社会大同和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也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政权合法性的传统——正确处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关键是如何处理政权与群众的关系。两者的结合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伦理核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它体现为三个根本元素:一是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不动摇,二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三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动摇。

完善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的路径选择

王帆宇在《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撰文指出,生态环境的特性决定了生态环境领域特别适合包括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以及社会组织以及公众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多元共治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新思路,具有主体、效率、成本以及制度安排等优势。然而,由于有限理性、利己主义等原因,在生态环境多元共治过程中存在政府环境监管的公信力有待加强、企业环境治理的主体性作用发挥不够、社会力量参与环境治理的能动性不足以及跨部门治理主体间协同性不强等问题,这必然会给多元共治的实现带来一定的阻碍。达成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格局,需要培育多元共治的价值共识、厘清多元主体的职责定位、创新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的体制机制、完善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的法律体系。

渐进式技术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邹坦永在《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撰文指出,渐进式创新可演化为激进式创新并能开辟新的演化轨道,激进式创新可开创新范式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技术创新演化的本质是渐进式创新,技术创新的渐进性是普遍规律。渐进式

技术创新是科技创新演化和市场运行客观规律的内在反映,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不可或缺。虽然新兴技术领域取得了一定创新成果,但是其市场绩效依然不显著,仍然需要在科技前沿领域进行渐进式创新。继续深化第一窗口机遇期,牢牢把握新一轮变革的第二窗口机遇期;坚持以渐进式技术创新,推动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兴技术产业发展高质量以及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发展高质量。

新科技运用于产业发展须有新规则为其铺路

金碚在《中国科技论坛》2021年第2期撰文指出,当前,人类科技进步与产业变革正携手走向纵深领域。一方面,科学研究及其推动的新技术在产业发展中的运用不仅创造了新产业,可以很快形成大规模网络化态势,而且有跨领域扩张的巨大能量;另一面,新科技运用于产业发展越来越直接触及人的价值、伦理、文化的深层规范,前者如信息技术、互联网、大数据、金融科技,后者如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基因工程、媒体嬗变等。新科技运用于产业发展,尤其是大规模扩张,必须要走在“正道”上,这就要有新规则为其铺路,有路才能走正道。新规则与新科技相互适应、相互促进,新产业才能健康有序地蓬勃发展,市场经济才能不仅张扬其工具理性,而且植根于人类的本真理性。可以期待新科技的大规模跨领域运用,推动产业升级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也要求做到让新科技的产业运用更好地有利于维护和优化市场竞争秩序,能够让全体人民的生活更加安全、健康、适宜、幸福。

地方特色、网络口碑与农产品上行

雷兵、王巧霞、刘小在《中国软科学》2021年第2期撰文指出,总体上讲,相对于普通农产品,“地方特色”农产品更容易获得电商市场的认可,上行更通畅。“地方特色”对于农产品上行的影响,不同类别农产品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农产品上行过程中,网络口碑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互联网时代,网络口碑对消费者购买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一

要重视网络口碑建设。建议各地政府通过农产品认证、产地溯源等方式净化市场,为当地特色农产品做大做强保驾护航。二要重视区域品牌建设。建议各地政府采取差异化竞争战略,将区域品牌的集体声誉和产业集群、规模化发展联系起来,通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农产品标准体系建设、龙头企业扶持、政府辅助营销推广等方式,将本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打造成有影响力的区域品牌。三要重视社交电商发展。

人工智能伦理规则的产品质量立法构建

宁金成、李瑞升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撰文指出,人工智能替代人类决策的特性,使得人工智能直接面对伦理判断与选择,因此其自主决策应接受人类社会伦理规范检验。目前人工智能的出现并没有颠覆民法体系,没有必要赋予人工智能民事主体地位,但作为物的人工智能与人类道德密切相关。人工智能在本质上属于产品,可以改进产品质量法中的产品制度建立人工智能伦理规则。人工智能产品质量标准应增加伦理规则,人工智能投入市场前应接受伦理规范审核。人工智能产品应建立伦理缺陷制度,鉴于伦理缺陷难以证成,人工智能产品违反伦理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对产品是否存在伦理缺陷承担举证责任。人工智能的“智力”发展不可限量,在今后人工智能可以控制、管理自己时,也可能会成为法律主体而直接接受法律法规、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

黄河文化的标识与家国情怀

杨海中、杨曦在《地域文化研究》2021年第2期撰文指出,任何民族的文明都有自己的标识与文化精髓。黄河文化是产生于黄河流域的文化,即起源于远古、产生于夏、成熟于商周、发达于汉魏唐宋、传承于今之民族文化,其包括以农耕经济为中心的物质文明和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制度和精神文明。凝聚民族文化的汉字是黄河文化的载体标识,辉煌的王朝古都是黄河文化的物质标识,神

秘的河图洛书是黄河文化的源头标识,闽粤赣客家民系是黄河文化的传播标识,先秦的元典观念是黄河文化的精神标识。黄河文化是历史上的国家文化,其精髓之一是崇高的家国情怀。

教育扩展与教育分化对城镇相对贫困的影响

何春、刘荣增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后,反贫困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上来。教育扩展作为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是增强劳动者技能、促进劳动力就业的有效方式;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对于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减缓相对贫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第一,促进教育扩展。首先,政府要增加教育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同时还要顾及社会资本参与教育教学投资,加强对教育、科研的投资力度,增加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途径,为居民创造丰富的教育资源。特别是要加强城镇地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经费投入,保证农民工子女在城镇地区有学上,上好学。其次,建立教育投资评估体系,提高教育资金的利用效率,推动教育经费使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换。同时要加强对教育经费的监管,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二,促进教育公平。首先,促进不同地区的教育公平。要建立省际、县际间的横向教育转移支付制度,鼓励富裕省份帮扶落后省份,促进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提供能力的均等化。其次,促进不同类型的教育公平。要加大对技术教育的资金和人才支持,并通过政府和企业联合办学针对性地培养企业发展所需的人才,提高技术教育的吸引力。最后,促进不同收入群体的教育公平。要为低收入家庭子女入学减免学杂费,提供生活补助,减轻学习的经济困难。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改革高校奖学金、助学金贷款政策,为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助学贷款、减免学费或者提供实习岗位等办法使其接受更多的教育,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改变收入状况,减缓相对贫困。